上一本叙事色彩极强的调查作品，还是《中国农民调查》。巧合的是，《中国农民调查》与是书《小镇喧嚣》都出版于21世纪初。但不同的是前者是文学家写得一本纪实色彩的非虚构作品，后者则是社会学教授吴毅以“讲故事”的策略完成的学术作品。

有趣的是，“讲故事”占主导因素的作品（作者所举《叫魂》的叙事性和分析性其实兼具），在学术生产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产品线”的上游。这意味着在更贴近一般读者（尤其是那些不喜欢阅读大段理论性较强文字的读者）的同时，把分析的工作更多的也留给了读者来完成。本书在理论上的创见确不丰富，作者在乡镇中一年半的考察，所看所了解到的内容当然不止所写的这些，但从作者的选择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作者引导读者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因而无论读者在此基础上做出怎样的解读，大多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在分析，而不近似于文化理论的“再阐释”。如果追求一本相对平衡的人类学作品，当然可能会期望作者在结尾部分的理论分析再丰富一些，甚至能够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那么对于“学术生产”来说，自是再好不过。不过我们也需注意到，理论不可避免地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任何抽离都伴随着失真与片面，人人都去追寻一种新的理论，反倒不一定会促进学术的发展，反可能使人晕头转向、不知所谓，本书的处理方式不失为一种可取之道。

本书的写作基于作者一年半田野调查所写出来的数十万字的调查日记，可以猜想，正文中的不少内容都是直接从中摘选然后润色而成的。我们可以观察到一有趣的现象，刚刚进驻乡镇时，作者会经常将所见所闻，与曾读过的理论想联系，甚至在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交谈时，用学术性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随着作者田野实践的展开，理论性的文字少了，更多的是叙事性的、单纯记录的，我们可以认为理论已经在开头说完了，也可以说，随着具体经验的输入，单纯理论性的分析终究是灰色的，而现实是彩色的。

本书出版时间是2007年，作者田野考察是在2003-2004年进行的，有些现象，由于政策的调整，现在已经不可能原样出现，但有些事情，则基本上原封不动。在作者与乡镇林书记交谈时，“政治规律”显然在书记的心中要胜过“经济规律”，而所谓“政治规律”，就当时的语境来说，无非是上级一二人的主观想法，与老百姓的贴身利益无关，更与科学规律无关，今日看来依然如此。“搞开发实质上就是卖土地”，这是乡镇武镇长的原话，也是土地财政的基本逻辑，一切财政的运转都是围绕着开发所实现的创收来的，土地财政已然事实上崩溃（但在“政治规律”上却并没有）的今天，各地乡镇的日子，大概要远远艰难得多。

本来，乡村应该是农业为主，但是作者通过亲身的观察，彻底地理解了“农业真正是没有出路”，农业无法支撑起那样庞大人口的生活，如果单纯依靠农业，只能维持在一个极低的生活水平上，如果要大多数人的富足，只能使农业成为少数人的职业（这也是发达国家一般的规律）。

本书是以叙事为中心的，每章的推进，切分为多个小块，多个事件各自发展一点，在叙述上同步进行。本书之所以是一本学术性著作，相对于《中国农民调查》而言，除了更多学术语汇的使用外，还有一点是观察的角度。《中国农民调查》是完全从同情农民，试图帮助农民的基本点出发的，而本书则不持有一种先验的态度，作者既看到了农民的“可怜”，也看到了他们的“可嫌”，这一面又是从来不进入主流政治与德性话语的。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了黑泽明的《七武士》，其中关于农民的独白亦是令人振聋发聩。

在中国国家发展的问题上，观察者往往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在国家建构上过于成熟（如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而法治与负责制政府做得不够。但是作者的一观察很有意思，作者从两场官商角力中看出，现代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于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力度还远不那么成功，乡镇仍呈现出国家正规性管制化努力与民间社会逃逸管制之间的反复搏弈。不过这一观察未必会导出需要特别加强“国家政权建构”，反倒提醒我们应该先从最薄弱点出发，即使两者未必是互补或促进关系，但显然一个方面已经陷入了边际效益的陷阱，不妨先投入力少效多的。

本书的内容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展开讨论。作者在终章分析的落脚点，放在了权力格局“错置”、官民行为“悖论”，和非正式权力技术上面，这些都是后来学者反复谈到的问题，本书则往往也作为资料之一而被引用。作者最后的建议是，当下乡村治理的改善，既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行政架构重置，也不是在集权与分权、收权与放权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更应该从“类丛林状态”走到一种新的有序竞争的合作搏弈来。这与笔者前所说的“法治”与“负责制政府”的问题，异曲同工。